



郑永年看中国

改革 及其敌人

郑永年 著

THE REFORM AND ITS ENEMIES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改革 及其敌人

郑永年 著
黄彦杰 编

THE REFORM
AND ITS ENEMIES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及其敌人 / 郑永年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9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

ISBN 978-7-213-04545-5

I. ①改… II. ①郑… III. ①政治改革-中国-文集 IV. ①D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510 号

书 名	改革及其敌人
作 者	郑永年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利波
责任校对	杨 帆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4.5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545-5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编者序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评论文章。《改革及其敌人》是本系列的第三册，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国内政治的文章。

过去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剧烈转型的十年，与此同时，国内政治过程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精英政治、领导风格、治理方式、意识形态到党内民主和利益代表，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并未停滞，而是努力针对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作出各种应对之策。虽然政治改革还未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主体部分，但正如郑永年教授所反复强调的，政治改革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改革的最后一步，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步骤。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无论是裹足不前还是全面西化，都不符合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充分理论准备和制度建设基础上的坚定而渐进的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合理之路。本册所精选的郑教授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观察文章，大多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展开，涵盖了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等改革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对围绕着党内民主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探索。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读者。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变动中的精英政治、国家社会关系核心的“契约”问题、腐败及其治

改革及其敌人

The Reform and Its Enemies

理、意识形态重建、政治开放、利益代表、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和挑战等。这九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永年教授对于国内政治改革的思考。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且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思考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黄彦杰

2011年5月于新加坡

目 录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3
-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6
-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9
-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12
-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15
- 回到邓小平? 18
-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22
-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26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

-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35
- 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38
-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41
-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44
-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47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53
-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56
- 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59
- 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62
-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66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70

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77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80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84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87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90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94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98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103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111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114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118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122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126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130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135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143

阶级性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146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149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152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155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159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163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169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172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175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179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 184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188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192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197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203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211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214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217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220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223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226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229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232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235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239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247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251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255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260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264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270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277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284

1
改革及其敌人

第一部分
《《《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外界早在纷纷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组成，谁上谁下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题为“第四代领导人的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与众不同，主要聚焦于未来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谁会担当什么领导角色还不明朗外，未来一届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再者，与会者也同意中共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如共产党本身的转型、法治建设、社会矛盾、新经济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一和外交战略，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所不能确定、同时也使人担忧的是未来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从毛泽东时代全部由革命家组成，转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又称专家治国）集体，或者说中共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这种转型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治国从 80 年代初开始，到江泽民时代达到了高峰。根据王赓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说法，江泽民可以说是把技术官僚的优势推到了一个极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在经济方面，江泽民顺利地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且提供给私人经济以宪法上的保护；在政治方面，尽管改革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随着江泽民“七一”讲话容许资

本家加入共产党,从长远看实际上为中国政治变化引入了动力。本来这些问题都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但高层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或者把它们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和世界贸易组织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政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

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对这一点高层不是没有认识,但关于如何转型还没有很大的进展。除了一些功利主义取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外,人们看不出高层有任何宏观的政治考量。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如何改变目前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许是未来领导人的主要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1年11月20日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中国那么大，大事不少，选择哪几件大事以及如何做所选择的大事，关系到新领导层的“业绩”问题。中国非民主国家，领导层非老百姓所选，领导人能否做些漂亮的事情，对其政治合法性非常重要。做好了，人民就认同他们；做不好，人民就很难认同他们。再者，如果领导人做好了大事，合法性高了，权威也高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就会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同时，议程选择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很重要。议程选择对了，路径走对了，国家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对，留下不好的遗产，就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议程选择的重要性明确表现在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在 90 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在中共十四大上，经济路线已经确定，大方向已经定型，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做这样的选择不能说是不理性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样的选择有很大的代价。把台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或许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是要回应台湾内部的变化；但是，一旦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问题就来了。这一选择把所有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最敏感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并且两岸都是如此。这样，两岸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问题出

现了，领导层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两边吵吵闹闹，到现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选择政治改革更是个错误。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确立，应当说在政治上应该有所动作，来配合经济改革。由于没有政治改革，腐败变得不可遏制，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改革尽管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毕竟这一步已经走了过来。例如俄罗斯，不管怎样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民主构架。而中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发展到这一步，并且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这一关最终还是要闯过去的。9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代领导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政治议程的选择有所偏颇，后来的调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问题上，领导层认识到，台湾问题与其说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中美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环。这种认识驱使领导层把重心转向中美关系，而非台湾。这种转移是相当有效的，近年来台湾方面也有各种动作，但大陆方面并没有像早些时候那样事事必有激烈的反应。尽管如此，两岸并没有发生像1996年那样的危机。在内政方面，在经历了“三讲”运动以后，高层也放弃了这样的传统概念，转而提出“三个代表”的新概念，这个概念较之“三讲”，更能让人民和官员接受，对中国政治变迁的意义也较大。

现在又到了新领导层做议程选择的时候了。几个新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会影响到国家今后内政外交的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似乎不想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议程，甚至有淡化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大国关系。胡锦涛这次参加八大工业国会议就是大国外交的一个好开头。这对台湾问题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强调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给台湾设置了一个“笼子”，如果大陆能够和大